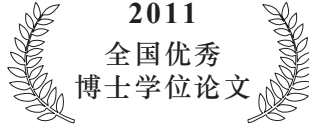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 ①
Serie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 Buddhist Literature 1



《中论颂》与《佛护释》

——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AND BUDDHAPĀLITA'S COMMENTARY

A Philological Study on the Basis of
Newly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叶少勇 著
YE Shaoyong



中西書局

目 录

丛书总序	段 晴 (1)
前 言	(7)
缩略语	(9)
绪 论	1
0.1 写本概况	1
0.2 校勘方法	4
0.3 文献概介	5
第一部分 研 究	
第一章 导 论	7
1.1 龙树	7
1.2 中观派源流	11
1.3 《中论颂》	14
1.4 佛护	22
第二章 写本的字体学研究	25
2.1 基本特征	27
2.2 字形比较	27
2.3 结论	38
2.4 字体表	40
第三章 基于新写本对《中论颂》文本的再检视	51
3.1 《中论颂》的文本修正	52
3.2 《中论颂》传本差异的痕迹	58
3.3 结论	78
3.4 其他异读	78

第二部分 写本校勘

校勘说明	81
《中论颂》梵文写本校勘	83
《中论佛护释》梵文写本校勘及藏译对照	93
《中论佛护释》梵藏索引	157
附 录 西藏自治区存中观学梵文写本初步概览	169
引用文献	185
英文简介	199
图 版	203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保护

Contents

Preface to the Series	Duan Qing (1)
Foreword and Acknowledgments	(7)
Abbreviations	(9)
General Remarks	1
0.1 Manuscripts Information	1
0.2 Editing Method	4
0.3 Philological Survey	5
Part 1: Studies Relating to the Manuscrip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and Retrospection of Madhyamaka Studies	7
1.1 Nāgārjuna	7
1.2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Mādhyamika	11
1.3 The <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14
1.4 Buddhapālita	22
Chapter 2: A Pal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Manuscripts	25
2.1 General Features	27
2.2 Comparision of <i>Akṣaras</i>	27
2.3 Conclusion	38
2.4 <i>Akṣara</i> List	40
Chapter 3: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on the Basis of the Newly Identified Manuscripts	51
3.1 Emendations to the <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52
3.2 Hints of the Textual Lineage of the <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58
3.3 Conclusions	78
3.4 Other Discrepancies	78

Part 2: Critical Sanskrit Editions of the Manuscripts

Editorial Policy and Conventions	81
Critical Sanskrit Edition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83
Critical Sanskrit Edition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 with Tibetan Translation	93
Sanskrit-Tibetan Index of the <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	157
Appendix: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Madhyamaka Text	
Preserved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169
Bibliography	185
Introduction for English Readers	199
Plates	203

丛书总序

段 晴

以叶少勇博士的《〈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范慕尤博士的《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的对勘与研究》为首发，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正式推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

此系列所谓“梵文贝叶经”沿用的是此名相外延的意义。

梵文，简而概之，曾是古代南亚次大陆通行的书面语言，是传承了印度文化的语言。印度古代的可以分为学科的著作，例如天文、数学、医学、哲学，等等，都是用梵文著述的。佛教的一部分著作，也是以梵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上那些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求法高僧所赍得之佛经，大多数是梵文的。提出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主要针对的便是跨越了时空幸存于中国境内的梵文佛教典籍。

然而，古代来自天竺的佛教典籍，并非全部是用纯梵文完成的。众所周知的佛经之藏，还有巴利语大藏经，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得到传承。巴利语，正是天竺俗语之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阿富汗佛教遗址有大量佛经重见天日，这些佛经残片，按照语言，并非是纯梵文的，有些属于印度西北方言，又称犍陀罗语。有些在俗语的基础上发展出兼有纯梵文的模式，这样的语言被称为混合梵语。进一步说：所谓纯梵文，是指无论从正字还是从语词形态的变化，皆符合印度古代文法家波你尼设定的标准。俗语，具备独特的正字和语词形态变化。混合梵语，则是指偏于纯梵语的正字，而词形变化，则兼有俗语的形态。梵文贝叶经整理和研究项目，不仅限于纯梵语的典籍，凡是中国境内出土的、流传下来的梵文的、俗语的以及混合梵语的写卷，皆是此研究考察的客体。

这里所谓梵文贝叶经之“贝叶”，仅仅是书写材料的代名词。“贝叶”一词本身，是外来词语和汉语词义的组合。“贝”从梵语 *pattra* 拟音而得。正如古人云：“贝叶者，即多罗树叶也，犹此方竹帛简牍之类。载能论文，可以披取。”¹ 古代天竺，没有纸张，习惯用多罗树的叶子作为书写材料。对于这种书写材料，玄奘

¹ [宋] 子璇录：《起信论疏笔削记》卷1，CBETA, T44, no. 1848, p. 301c。

法师游历印度，行至南印度荼建那补罗王城时，曾特别记述：“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¹ 唐代慧琳所制《一切经音义》甚至将写经的过程，描绘得如历在目，谓“此叶粗厚，鞭而难用，若书多以刀画为文，然后置墨。为叶厚故也”。这种以刀画为文，然后以加墨显字的方式至今仍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可得观。然而贝叶仅仅是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当佛教传播到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时，在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中亚之前，用来书写的材料，“随方国土，或用赤桦木皮，……或以兽皮，或以金银铜叶”²。书写材料应用之广泛，尤其体现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以及中亚等地发现的写本之中。上世纪初，以及近年来新疆等地发现的写本，有些书于纸张上，有些书于羊皮上，也见到有书于丝帛之上的。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区出土的梵文佛经残片，则大多写于桦树皮之上。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附近发现的大量梵文写本，在时间上要比收藏在西藏的梵文写本早几百年。这些俗称吉尔吉特写本，唯有梵文本的《一切庄严王功德经》是写在真正的贝叶之上，而其他写本皆书写在裁成贝叶状的桦树皮之上。产自印度的真正的多罗树叶，虽未在中亚地区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多罗树叶的形状，还是影响了佛教流行的地域。贝叶经，实际上又是印度书形纸的代名词。

梵文贝叶经在中国存留下来，是绝无仅有的人类文明的现象。对于梵文文献的梳理和诠释，在学科的划分中属于印度学研究领域，似是非汉的，非中华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然而这一领域，却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接连。中印文化之间，曾经数百上千年的交流。佛教传入中国，犹如涓涓细流，融入华夏之地，滋养了华夏的文化。佛教在中原，与道教、儒教并列，成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佛教在西藏，则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擎天柱。教自西方，法流东夏。而构成这历经千百年而不枯涸的细流之水的，正是梵文贝叶经。后来，大约到了 13 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源头断而流未涸。梵文贝叶经，毕竟具有超越人类之寿的生命力。尽管玄奘、义净从印度赍得的梵文贝叶经卷，恐早已与无数汉籍一道，同毁于涤荡中原的兵燹。但是，在新疆和西藏，梵文贝叶经存留下来。

季羡林先生生前多次告诉我们，新疆和西藏是中西文化交流得天独厚之所在。针对新疆，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¹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889 页。

² [唐] 慧琳著：《一切经音义》卷 10，CBETA, T54, no. 2128, p. 367b.

新疆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所在。东方文化从这里传到西方去，西方文化从这里进入东方”¹。对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的研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近年来已经发现的多种语言的写卷以及梵文贝叶经的残片已经充分证明了季羨林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田地区新出犹太波斯语古信札，揭示了波斯犹太部落迁徙的痕迹。新发现的粟特语文献，印证了和田地区有粟特聚落的存在。于阗语蚕茧丝桑等文字的重新定义，仿佛为古代丝路平添了以桑园、丝织、商队往来为内容的画卷。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近年来对新疆地区新出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发现了多部佛经的残片，其中有《撰集百缘经》(*Avadānaśataka*)、般若部类(*Prajñāpārāmītā*)、《宝星陀罗尼经》(*Ratnaketuparivarta*)、《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首楞严三昧经》(*Śūraṅgasamādhisūtra*)、《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ṇabhāṣottamasūtra*)等已为世人所知的梵文佛教经籍，还首次发现了《贤劫经》(*Bhadrakalpikasūtra*)的残片。这些佛教残片，明显带着因人类宗教信仰的变迁而造成的创伤，残破而零星分布。然而，这些残片最能证明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的历史，对于佛经传译等领域，有着非凡的意义。对新疆新出梵文贝叶经残片整理和研究，将是此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所呈现的重点之一。

与新疆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之零星残破截然不同，西藏所收藏梵文贝叶经基本完好，多集中于西藏的寺院中。这些梵文贝叶经，曾经历各种途经而达到西藏。11世纪，当穆斯林的铁骑横扫印度北部地区，佛教寺院毁于一旦，一些佛教高僧，携带着被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梵文贝叶经，逃亡到尼泊尔，逃亡到西藏，为这些梵文贝叶经找到了永久的家园。翻阅梵文贝叶经，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字体，标识它们的源起之地各不相同。看着这些梵文贝叶经，仿佛可以看到西藏那些著名的翻译家、学者如仁钦桑波(958-1055)、布顿仁钦朱(1290-1364)如何手拿把持这些写卷，而将其中的内容翻译成藏文。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出抄本的笔手。每一部写卷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象征着人类为思想、信仰而付出的努力。

西藏的梵文贝叶经，曾经令20世纪初期来到西藏的印度学者、意大利学者兴奋不已，多少国际学者期待着能撩起罩在手稿之上那层无形的纱罩。梵文贝叶经因其年代久远，记载的内容丰富，是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语言、历史、艺术、哲学、宗教等的重要资料，也是解决此类学术研究中各种疑难问题的最可靠、最原

¹ 季羨林：《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载于《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始的文献依据。因此，长期以来，梵文贝叶经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学术研究的珍宝。对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季羨林先生曾经给予这样的评价：“过去，我们中国由于有了敦煌石窟的藏书而对世界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经轰动过世界。今天，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就其意义来说，至少可以同敦煌宝藏媲美。这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西藏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敦煌学这个响亮的名称久已蜚声世界学术之林。如今应该再有一个西藏梵文贝叶经学，我相信，这个同样响亮的名称也将会蜚声世界学术之林。”¹

如果说一百年前，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不得不目睹各国列强对敦煌藏经洞的掠夺，“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曾经是令中国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往事。那么梵文贝叶经以及新疆古代西域语言的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中国学者的屈辱所在？原始资料在国内，却成为国外的学术推动力，对这其中的屈辱，以季羨林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比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

季羨林先生生前十分关注对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期望中国学者能够独立地实施这项工程，因为在此领域，不但可以拿来运用和发扬国际水准的印度学的学术方法，而且聪慧的中国学者将能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在印度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领域，“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作出至少不低于其他国家学者水平的贡献，这才符合我们国家的地位。”² 季羨林先生是把印度学植入中国学术界的第一人，他是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工程的开光者。1988年，蒋忠新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西藏梵文贝叶经的转写本《妙法莲华经》，季羨林先生亲自写下序言，他老人家这样规划：“我们将精选一些海内外的孤本和虽然不是孤本而原文比较有价值的佛典或其他梵文经典，甚至包括一些印度教经典和印度古代自然科学著作在内，逐步加以编纂、影印、整理、校刊，公之于世，让全世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学者能有机会利用。”³ 季羨林先生的规划，为中国的印度学学者指明了方向，也对我们这里推出的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的基本内涵，做了提纲挈领般的概说。

季羨林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依然关心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事业。多少次，他告诉我们，这个领域因为需要的基础知识非常庞杂，所以不是一个容

¹ 此段落引文均引自季羨林：《〈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载于《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² 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³ 季羨林：《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序言》，载于《季羨林文集》第七卷（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易把握的领域，需要智慧，更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积累。人文学科尤其需要几代人的积淀。为了更有效地继承和发扬季羨林先生开创的事业，于 2004 年，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将培养学生和研究工作的重心，倾斜到对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之上。几年来，北大师生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了具有我们特色的研究成果，大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梵语巴利语专业教学和科研的栋梁，引起国际同行学者的关注和赞誉。如果没有季羨林等老一辈学者的积淀，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阐说开启整理研究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现代意义时，季先生认为，这项工程“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的研究，促进印度佛教史的研究”¹。这其中折射的，是一位纯粹学者的美好愿望。北京大学印度学的师生，将继承发扬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事业，把由季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代代传递下去，实现老一代学者也是代代学者美好的愿望，让古老而神奇的外域文明，再复于中华开出新鲜而绚烂的花朵。

相对于梵文经卷的译经历史，我们的传承是古老的。相对于现代欧美日的印度学，中国的印度学是年轻的。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推出此崭新的丛书，必然携带着稚气，免不了疏漏。在此，对一切善意的批评和指教，我们将欣悦欢喜而奉行修订。《诗经》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愿此著述之鸣，广泛地引起国际国内同行学者的共鸣友声。

2011 年 9 月 7 日于北京

¹ 季羨林：《〈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载于《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04 页。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保护

前 言

本书是在笔者 2009 年 6 月提交北京大学南亚学系的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相比原论文，这里主要的变化是增补了一些新的参考书目，删去了原论文中的“译注”部分。原论文曾选取《中论佛护释》第 1、2、7、13 品，基于藏译和梵文残本作了一些尝试性的现代汉语译注。考虑到这一文献在中观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却从未有汉译本，因此我想留待将来译全后单独出版。

本书的主题是新发现的两部梵文贝叶经的文献学研究。对原典的发掘、释读、校勘、对照，是佛教学中的基础研究。这一事业在国外已经开展了一个多世纪而方兴未艾，国内研究界对此仍比较陌生，甚至还有质疑这一工作的价值。笔者以为，“识文昧义”固不可取，“隔文断义”则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进步。针对这一状况，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搜集和介绍国外的文献学资料，尤其是梵文校勘本和现代语译本，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深入。另外应当说明，虽然笔者在修订论文原稿时补录了一些最新资料，本书参考文献的主体是截止于 2009 年，挂一漏万之处，祈请读者原谅。

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以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到，有太多的人对我倾注了心血，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段晴教授，自我梵语启蒙之日，便跟随段师学习。是她指引我深入宝藏专攻梵文写本，并将这一重要写卷交付于我作博士课题，还为我创造出国交流和深造的机会。特别感谢王邦维教授，授业提点，慈心加被，在各个方面给予我指导和关怀。还要衷心感谢姜景奎教授、高鸿博士、湛如博士在我攻读博士期间对我的教诲与帮助。

衷心感谢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辛岛静志教授和东京大学斋藤明教授。本书的主体部分写成于日本留学期间，我曾师从二位先生并深受教益。就写本释读等问题，笔者曾与辛岛静志教授、斋藤明教授、大正大学长岛润道博士以及诸多国际友人定期会面讨论并获得大量宝贵建议，文中难以逐一提及，此处一并致谢。还要感谢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日本佛教大学松田和信教授、吹田隆道先生，日本创价大学工藤顺之博士、玉井达士博士，以及 Jan Nattier 教授和 Giuliana Martini 博士在我留日期间所提供的各种指导与帮助。

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炤研究员、Anne MacDonald 博士、美国哈佛大学 Michael Witzel 教授、德国汉堡大学 Harunaga Isaacson 教授、杨媚女士、Peter Skilling 博士、德国 Lore Sander 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McComas Taylor 博士在各个方面对我提供的无私帮助。

衷心感谢萨尔吉博士、吕新国先生、Andrew Glass 博士、何欢欢博士、吉崎一美先生、杨朝华博士、平林次郎先生、肖越博士、白云马先生为本书写作提供的资料与宝贵建议。

衷心感谢钦哲基金会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经费，以及许功化女士给予的帮助。衷心感谢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及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为我赴日留学提供的奖学金和各种便利。衷心感谢 Nader Rastegar 先生、Laser Performance 公司和赵毅华女士为我提供的慷慨资助。

衷心感谢中西书局李梅、刘寅春编辑为本书所作的努力。

最后要着重感谢我的父母，由于科研任务和出国等原因，我长期无法陪在二老身边，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理解。

感谢所有上面没能举出的曾帮助过我的人。

本书中的错谬之处，则由笔者一人负责。

叶少勇

2011 年 2 月

缩略语

- 《安慧》 安慧造《大乘中观释论》，卷 1-9，《大正藏》第 1567 号，卷 30 第 136 页上；卷 1-18《中华大藏经》，卷 68，第 778 页；《高丽藏》第 1482 号，卷 41，第 102 页下。
- 《般若灯》藏 = PP；藏译清辨造《般若灯论》（*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ṛtti*），东北 3853；大谷 5253
- 《般若灯》汉 汉译清辨造《般若灯论释》，《大正藏》第 1566 号，卷 30，第 50 页下。
- 布达拉本 《明句论》梵文贝叶写本，布达拉宫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 《长部》 *Dīghanikāya*, 3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90-1911.
- 大谷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 -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 - 总目録 附索引』，铃木学术财团，1962。
- 《大事》 *Le Mahāvastu*, 3 vols., edited by Émile Senart.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2-1897.
- 《大正藏》 《大正新修大藏经》
- 大众部《戒本》K. Seishi Karashima.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of the *Prātimokṣasūtra* of the *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 (1).” *ARIRIAB* 11 (2008): 71-90.
- 大众部《戒本》T. *Prātimokṣasūtram of the Lokottaravādimahāsāṃghika School*,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16, edited by Nathmal Tatia. Patna, 1976.
- 狄雍本 = dJ；《中论颂》狄雍刊本，见 de Jong 1977
- 东北 『西藏大藏经总目録 东北帝国大学藏版』，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4。
- 东大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 《法集要颂》梵 *Udānavarga*,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10, edited by Franz Bernhar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1990.
- 《法句》巴利 *Dhammapada*, edited by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 R. Norman.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5.
- 《法句经》巴特那 Margaret Cone. “Patna Dharmapada: Part I: Text.”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3 (1989): 101-217.
- 《佛护》藏 = BP；藏译《中论佛护释》（*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东北 3842；大谷 5242
- 《佛护》梵 = BP_{Ms}；《中论佛护释》（*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 根有部《戒本》 *Prātimokṣasūtra (Mūlasarvāstivāda)*, edited by A. C. Banerjee. Calcutta, 1954.

- 《迦叶品》 *The K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 edited by 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Shanghai, 1926.
- 《俱舍》 *The Kāśyapaparivarta: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5, edited by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in collaboration with Seishi Karashima and Noriyuki Kudo.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 剑桥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 《龙树六论》 《龍樹六論：正理聚及其注释》，民族出版社，2000 年。
- 《罗炤目录①》 罗炤：“罗布林卡所藏贝叶经目录，附哲蚌寺现藏贝叶经概况”，未出版手稿，1984 年 12 月。
- 《罗炤目录②》 罗炤：“布达拉宫所藏贝叶经目录”，未出版手稿，1985 年 7 月。
- 《罗炤目录③》 罗炤：“山南地区文管会所藏贝叶经概况”，未出版手稿，1984 年 8 月。
- 《明句》藏 = PSP; 藏译月称造《明句论》（*Prasannapadā*），东北 3860；大谷 5260
- 牛津本 《明句论》梵文贝叶写本，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 帕坦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私人收藏（详见本书第 17 页）。
- 普散本 = LVP; 《明句论》普散刊本，见 La Vallée Poussin 1903–1913
- 《青目》 汉译青目造《中论》注释，《藏要》，卷 2，第 903 页。
- 《桑德目录》 桑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梵文贝叶经（微缩胶卷）目录》，未出版。
- 图齐本 《明句论》梵文写本，最初由图齐发现并拍照带回（详见本书第 17 页）。
- 《王森目录》 王森：《民族圖書館藏梵文貝葉經目录》，1985 年。作为附录影印出版于：Haiyan Hu-von Hinüber. “Some remarks o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Prātimokṣasūtra found in Tibet.” In *Jaina-itihāsa-ratna: Festschrift für Gustav Roth zum 90. Geburtstag*, edited by Ute Hüsken, Petra Kieffer-Pülz and Anne Peters,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2006, 283–337.
- 《无畏》 = ABh; 藏译《中论无畏疏》（*Mūlamadhyamakakārikāvṛty-akutobhayā*），东北 3829，大谷 5229
- 《西域记》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6》，1999 年，中华书局，2004 年重印。
- 《相应部》 *Samyuttanikāya*. 6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84–1904.
- 有部《戒本》 *Prātimokṣasūtra der Sarvāstivādins*, Nach Vorarbeiten von Else Lüders und Herbert Härtel herausgegeben, Teil II: Kritische Textausgabe, Übersetzung, Wortindex sowie Nachträge zu Teil I,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11, edited by Georg von Simson, Göttingen, 2000.

《藏要》	欧阳竟无编《藏要》，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中论》藏	= MK; 藏译《根本中论颂》(<i>Prajñā-nāma-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东北 3824; 大谷 5224
《中论》梵	= MK _{Ms} ; 《中论颂》(<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ABh	= 《无畏》; 藏译《中论无畏疏》(<i>Mūlamadhyamakakārikāvṛtti-akutobhayā</i>), 东北 3829, 大谷 5229
ARIRIAB	<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i> . Tokyo.
BHS(D, G)	Franklin Edgerton. <i>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i> , 2 vo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Reprint,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2004.
BP	= 《佛护》藏; 藏译《中论佛护释》(<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 东北 3842; 大谷 5242
BP _{Ms}	= 《佛护》梵; 《中论佛护释》(<i>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i>) 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Bu ston chos 'byung	Bu ston Rin chen grub. <i>Bu ston chos 'byung</i> . Xining: Krung go'i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 1988.
C	卓尼 (Co ne) 版《藏文大藏经》
D	德格 (sDe dge) 版《藏文大藏经》，目录见东北
dJ	= 狄雍本; 《中论颂》狄雍刊本，见 de Jong 1977
G	甘丹寺 (dGa' ldan) 丹珠尔金汁写本
IBK	<i>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i>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IJJ	<i>Indo-Iranian Journal</i>
JBORS	<i>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i>
JIP	<i>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i>
JNIBS	<i>Journal of the Naritasan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i>
JRAS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i> . London.
LVP	= 普散本; 《明句论》普散刊本，见 La Vallée Poussin 1903–1913
m.c.	metri causa. 为了适应格律而使用的非标准形式
MK	= 《中论》藏; 藏译《根本中论颂》(<i>Prajñā-nāma-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东北 3824; 大谷 5224
MK _{Ms}	= 《中论》梵; 《中论颂》(<i>Mūlamadhyamaka-kārikā</i>) 梵文写本，原民族宫藏。
MW	M. Monier-Williams. <i>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i>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N	那塘 (sNar thang) 版《藏文大藏经》
NGMPP	Nepalese-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
P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目录见大谷
PP	= 《般若灯》藏；藏译清辨造《般若灯论》(<i>Prajñāpradīpa-mūlamadhyamaka-vṛtti</i>)，东北 3853；大谷 5253
PSP	= 《明句》藏；藏译月称造《明句论》(<i>Prasannapadā</i>)，东北 3860；大谷 5260
SOR	<i>Serie Orientale Roma</i>
WZKS	<i>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i>

符号：

=	意义或行文相同
≠	意义或行文不同
*	该梵文词为拟构而无直接文献证据（在写本校勘中则表示 <i>virāma</i> ）
◦	若干梵文字母的省略

写本校勘所用符号见第 81 页

绪 论

0.1 写本概况

西藏自治区所藏的梵文写本，也许是世界范围内最后一处尚未完全探明开发的梵本宝藏。其数量之多、意义之重，堪称第二敦煌。上世纪 30 年代，印度学僧罗睺罗（Rāhula Sāṅkrtyāyan）和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曾分别造访西藏，将部分写本拍照并校勘研究。60 年代初，我国学者王森教授为运至民族文化宫的写本编制了简目¹。80 年代，罗绍教授曾赴西藏各地调查梵文写本并分别编制了目录。系统的勘察工作也仅止于此。长期以来这些写本虽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却始终尘封于馆室塔庙之中。2003 年，笔者在导师段晴教授的带领下列检阅北京大学藏“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的缩微胶片时，一函残破散置的贝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函散叶在《王森目录》中被列为“17 号梵文经残叶”，却未指明具体内容，其他目录也未见记述。散叶中掺杂的几片残破的贝叶，字形十分古老，与西藏惯见的 10 世纪以后的梵文字体风格迥异。经过分拣，从几十片散叶中一共选出 14 片字体相同的残叶，推定出自同一抄手。初阅之后，段晴教授发现这些残叶与《中论》有联系。辨识之初，由于参考资料的匮乏，笔者便像破译电码一般逐字推敲。这些写本的黑白胶卷摄于 20 年前，清晰度不高，常常无法区分笔墨与污迹。从照片来看，14 片叶面均有破损，有些甚至仅有寥寥数语可识。所有这些都为辨识工作增加了难度，造成释读进展缓慢。经过初步转写、推测内容并逐段比对相关藏译，到 2005 年才最终确认了写本的内容。这 14 片贝叶包含了两部写本的残片，其中 3 叶出自《中论颂》（*Mūla-madhyamaka-kārikā*），另外 11 叶出自《中论佛护释》（*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²。

¹ 西藏写本概况的介绍见本书附录部分 171 页。《王森目录》已经作为 Hu-von Hinüber 2006 的附录在德国影印出版。

² 两部写本都缺失题名，这里的梵名据藏译添补。

《中论颂》为公元 2、3 世纪时龙树 (Nāgārjuna) 所著, 全文共 27 品约 450 颂, 是中观派立宗之本。新发现的这部梵文本, 若是全本应有 12 至 13 叶, 现仅存 3 叶, 保存了 107 首偈颂, 约占《中论颂》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迄今为止, 学术界得以窥见《中论颂》的梵文本, 是通过月称 (Candrakīrti) 所作注释《明句论》(Prasannapadā) 中的引文。根据内部流传的罗炤教授所辑西藏梵本目录, 哲蚌寺藏有一部《中论颂》全本 (参看附录 § 1.1.2)。如果属实, 这将是世界上首次发现《中论颂》的单行梵文抄本, 但是目前还不能为学者所利用。在这部写本公布于众之前, 本书报告的这部残本, 将是唯一能够利用的《中论颂》单行梵本。

《佛护释》是 6 世纪时佛护论师为《中论颂》所造注释。新发现的这 11 叶残本, 约涵盖 57 首偈颂及附带注释, 包括第 2、7 品约半数, 以及第 8、10、13、14、20 品各一部分。《佛护释》只存藏译孤本, 没有汉译, 这一残本是其梵文本的首次发现。藏译《佛护释》最后 5 品的内容与《中论无畏疏》藏译几乎完全相同。一般研究认为, 是在藏译时以《无畏疏》补《佛护释》之缺。此次发现的梵本不包含这部分。所以, 究竟是佛护本来就没有撰写这 5 品的注释, 还是写了却没有流传下来, 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将《佛护释》中与《无畏疏》等同的部分也计算在内的话, 我们的写本约占整个篇幅的九分之一。

由于笔者目前只能看到写本的缩微胶片, 无法接触原件, 所以一些涉及写本的原始信息仍然无法获知。从本书所附的照片图版可见, 这些叶面以两个穿绳孔为界分作三栏书写, 每栏约有 30 至 40 字 (akṣara), 每叶 6 行。因其边角圆滑、两端略窄的形制, 以及断裂处露出横向纤维的特点, 可以断定写本材质为棕榈树叶, 即通常所谓的“贝叶”¹。两部写本由于年代久远, 每叶都有不同程度的断裂和磨损, 其中 4 叶破损相当严重。虽然两部写本字体相同, 但以存有叶码的两片贝叶为依据, 对照藏译的篇幅, 可以推测这两部写本均有独立的叶码编号, 即都从第 1 叶开始。这也是笔者视之为两部写本的原由所在。

两部写本尺寸不详, 均不包含首尾叶, 未见题名和纪年。近年来西方有使用碳 14 测定的方式, 辅助字体学特征来为写本断代。但目前笔者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有鉴于此, 传统的字体学断代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手段。本书研究的两部写本的书写字体可以称作“后笈多体的东部变体”²。目前世界上尚未发现使用

¹ “贝叶”也称贝多罗叶, 是梵语 *patra* (叶、文书) 的音译与意译的结合。而“贝叶经”一词在中文语境中, 除了指在棕榈叶上书写的经典以外, 有时也用来称呼长条形制的纸质写本。在本书中用其狭义, 即棕榈叶制成的写本。

² 从时期和地域来判断, 这种字体大致属于“悉昙体” (Siddhamātrkā) 的范围。然而, 关于“悉

同样字体且带有纪年的写本。通过分析有纪年的尼泊尔碑铭，可以勾勒出一个尼泊尔地区的字体演变尺度，以之为参照可以推断这两部写本抄出于 6 世纪后半至 7 世纪前半（详见第二章）。基于这一断代，这两部写本将是已知现存最古老的中观写本。目前能看到的西藏梵文写本大多出自 10 世纪以后，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西藏 9 世纪时曾罹遭灭佛之难。因此，如此古老的《中论颂》与《佛护释》梵本能够流传于世，堪称奇迹。它较之佛护的活跃年代（约 470–540），也不过百年。

下表为新发现两部写本所含章品内容，颂文编号依照狄雍本（de Jong 1977）。

《中论颂》写本		《佛护释》写本			
叶号	偈颂	叶号	偈颂	叶号	偈颂
1–4	缺失	1–8	缺失	27–28	缺失
(5?)a	9.10–12, 10.1–15ab	(9?)a	2.5–7	29a	7.30–32
(5?)b	10.15cd–16, 11.1–8, 12.1–8a	(9?)b	2.8–11	29b	7.32–33
6	缺失	(10?)a	2.11–13	30–32	缺失
7a	17.29–33, 18.1–12	(10?)b	2.13–16	(33?)a	8.13
7b	19.1–6, 20.1–12a	11–20	缺失	(33?)b	8.13, 9.1–3
(8)a	20.12bcd–24, 21.1–8ab	[21?]a	7.1	34–35	缺失
(8)b	21.8cd–21, 22.1–5	[21?]b	7.1–2	(36?)a	10.2–4
9 之后	缺失	22	缺失	(36?)b	10.5–8
		(23?)a	7.3–6	37–41	缺失
		(23?)b	7.6–9	(42?)a	13.7–8
		(24?)a	7.9–13	(42?)b	13.8, 14.1–2
		(24?)b	7.13–14	43–67	缺失
		25	缺失	(68?)a	20.11–15
		(26?)a	7.17–20	(68?)b	20.16–18
		(26?)b	7.20–22	69 之后	缺失

* 圆括号表示原件叶号缺失，据是推算；方括号表示页码残损；问号表示不确定。

昙体”这一术语，其基本特征、时间地域范围目前都不确定。因此本文将避免使用该词，而代之以较为保守的命名方式，即冠以时期与地域。关于“悉昙体”术语的讨论，参看桑德尔《印度字体学中的术语之混淆与混淆之术语》（Sander 2007, 127ff., 尤其是 131, n. 69）。

0.2 校勘方法

自比定出这两部写本的内容之后，校勘工作又历时近两年，其间笔者数次调整编辑方法。当前学界的写本校勘方式分两大类——抄录本（diplomatic edition）与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抄录本注重客观再现写本原貌，依写本的分行进行编号抄录，通过各种符号的运用尽量重现写本的视觉特征，而保留所有的缺损、遗漏。精校本则注重可读性，将写本的内容按照意群分段，厘定笔误，规范正字，填补缺损，甚至以注释的形式加入文献研究的内容，例如比定引文和平行文本等等。很多学者在校勘梵本时会同时刊出这两种形式的文本。但是，近年来对此出现了反省与批判的声音。就抄录本来说，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存在真正的客观。梵文写本中没有分词的空格，只要抄录时添加了空格，便已经加入了主观判断，更不用说对于受损字迹的辨认。对于精校本的编辑，又往往难以区分是抄写错误还是某时某地的惯用形式，因此对文句的厘定往往抹杀重要文本信息，以至于编出一个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文本。虽然同时做出两种形式的刊本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矛盾，却不仅增加了编校者的工作量，更使读者须同时翻看而颇为烦费。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将这两者合一，即通过各种规范与符号的运用，在文本校勘中尽量保留原文信息，却也不刻意追求写本原貌。文本校注与文献研究则置于脚注，以增进文本的可读性。这种方法虽然还有一些技术问题而称不上完美，而且尚无统一的范式，但却经济实用。本书在写本校勘部分将采用这种方法。

另一个须要说明的问题是学界对于梵文重构（reconstruction）的态度。梵文重构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将尚未发现梵本的著作从藏译或汉译返回译成梵语。上一世纪出版了很多这样的重构文本，其作者多为印度学者。这类著作虽然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然而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其价值尚待商榷，而且一旦发现了梵文原本，便成为无用之功，所以近年来已鲜有学者热衷此道。第二种重构是在梵文原本佚失的情况下，根据其梵文注释本所提供的文本线索，参考藏译或汉译来恢复原本。这种重构的可靠程度取决于注释文献中引用文句的完整程度。若注释文献只是略引原文，就会给重构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然而相比前一种情况，这种重构文本更为可靠。在原本发现之前，这一工作对文献学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三种重构是在校勘有残缺的梵本时根据译文佐证或前后文义补出缺失的字句。虽然对这种做法的意义目前也有一些争议，但是如果写本存有多叶，而且叶面缺失又不过半，则重构的做法仍是主流。

前面已经说过这两部新发现写本的保存状况甚差，不仅有大段的缺失导致文脉难以贯通，而且有很多磨损的字迹介于可识与不可识之间，仅依照照片则斑驳漫漶难以辨识，若参考藏译推测其行文又似乎可出数语。遇到此种状况笔者采用的方法是，先从藏文反译还原整句梵文，再比照写本中残存的字迹，找出几个依稀可辨的字词，然后调整措辞语序，以使重构部分符合写本空缺处所能容下的字数，最后将重构与释读贯穿成句，刊作文本。为了将主观臆断的影响减至最低，校勘本中凡由笔者重构的字句均置于圆括号内，以示区别。圆括号内的正体字表示此处写卷缺失的是个别音节，这些音节完全可以根据上下文确定。斜体字则表示此处缺损较多，或者虽然缺损不多却无法根据上下文作出确定的推断，其文本是从藏文反译，有可能与梵文原文的措辞语序不尽相同。这种情况下，重构部分仅为疏通文义之用，不作文献参考。文本中也有几处虽经苦思冥想而不得善解，则留白以俟高明。

这样的做法虽不免主观之虞，却使得文本贯通可读，而不至刊作几个单词伴随一堆省略、缺损符号而已。其另一收获是，许多原已经令我灰心丧志的部分得到了成功的释读，最大程度地挖掘了写本的视觉信息，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工作量。笔者在校勘中体会到，整行的缺失并不难还原，往往是断断续续、似有还无的字迹，须费一番推敲苦吟才能填出符合的文本来。这样做的底气也在于，鲁意坚赞（Klu'i rgyal mtshan）的藏文译本精良可靠，用词规范固定。在与梵本的比对中发现的几处藏文讹误，也多为后世的误抄，而非误译。藏译本显然遵守了《翻译名义大集》（*Mahāvīyutpatti*，一般认为出于814年）等厘定规范，也因此推断该本译出于9世纪初。为了体现梵本与藏译的字词对应，笔者在文本校勘之后附上了《佛护释》写本的梵藏索引。

0.3 文献概介

中观学作为大乘佛教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但在佛教中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人类思想史上也独树一帜。与此不相称的是，由于印度佛教消亡而典籍散佚，中观文献的梵本存世很少。上世纪初，比利时学者拉·瓦雷·普散基于3部写本校订出版了7世纪时月称的注释本——《明句论》（*La Vallée Poussin 1903-1913*）。通过引嵌于其中的偈颂，现代学术界得以窥探《中论颂》的梵本真容。其后百年间，又有十几部《明句论》的梵文写本被陆续发现，遂使学者们能够对普散刊本进行修订与补充。狄雍将偈颂单独辑出并修订刊行（*de Jong 1977*），

成为后来研究《中论颂》的参考底本。然而，所有后来发现的梵本都仅限于月称一家的注释，文本谱系单一而缺乏旁支参照。如果说，透过五百年后的注疏来窥视《中论颂》的原文已经令文献学研究者颇感沮丧的话，则更甚者是大部分写本的抄出年代又向后推迟了近一千年，现存最古的两件《明句论》写本也不早于12世纪。为了细究龙树的遣词用意，梳理各家的纷争开合，学者们不得不隔着藏汉译本去推求揣测。笔者相信这一状况将因这两部写本的发现而得到改观。

由于这两部写本年代久远且别有承源，其中保存的《中论颂》文本，不但可以对普散和狄雍的梵文刊本作9处修正，还可以根据12处异读探查到各注本所引偈颂来自不同传承的一些痕迹。也就是说，这两部写本的某些读法虽然与以前《明句论》的刊本不同，却不存在孰对孰错之分，而是源于各注释家不同传本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部写本由同一人抄写并同置于一函，但比对异读的结果却表明，《中论颂》写本并不是《佛护释》所引偈颂的摘出辑录，而很可能归属于另一个文本传承系统（详见第三章）。《中论颂》这样一部洋洋四百馀颂的大论，经过了千馀年的传抄注解，其文本形态堪称稳定。然而，在不同的注释文献中一些偈颂在用词、顺序、增删等方面还是存在差异。虽然目前只见鳞爪，却已经使我们窥探到《中论颂》不同文本传承的蛛丝马迹。

龙树的《中论颂》继承“般若经”的空观思想开大乘理论之先河，其后曾数十家争相注解。6世纪时的《佛护释》在中观派的成立史与思想史上曾扮演重要角色。正是由于清辨对《佛护释》的尖锐批判，造成了中观派之内“自续”与“应成”的分道扬镳。而7世纪的月称对佛护的思想却极力推崇。在西藏，伴随后弘期时月称著作的译介，以及后来格鲁派的兴起，佛护、月称的“应成”一系遂被奉为中观正统。可以说中观派思想格局的形成，是以反对或拥护佛护为分水岭。这次《佛护释》梵本的发现，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部分弥补了梵本缺失之憾，除了有助于改正一些藏译本的讹误之外，对于今后的中观派文献、义理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Introduction for English Readers

The monograph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in June, 2009. It presents philological studies and critical Sanskrit editions of two incomplete Sanskrit manuscripts that have been recently identifi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formerly preserved in the China Ethnic Library, now stored at the Tibet Museum, Lhasa. They are the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MK) composed by Nāgārjuna in the 2nd or 3rd century CE, and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BP), written by Buddhapālita in the 5th or 6th century. Previous versions of parts of this disserta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in English (cf. Ye 2007a, b, 2008a, b, 2009).

Discovery of the manuscripts

Many Sanskrit manuscripts were lost due to the decline of Buddhism in India. In the past centur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discover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Nepal, Kashmir, Afghanistan and so on,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stud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might be the last treasury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which has not ye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For a long time, the manuscripts in Tibet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Nonetheless, they are still gathering dust on the shelves of monasteries or in the drawers of museums.

In 2003 while checking microfilms of manuscripts from Tibet with the help of my supervisor, Prof. Duan Qing,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fourteen palm-leaves that bore a very old script. These folios together with some others were cataloged by Wang Sen as “No. 17, Sanskrit miscellaneous leaves”, but their contents were not identified either in this or any other catalogues. After transliterating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ibetan texts, I was able to identify these folios as belonging to two manuscripts: three folios are from a separate copy of the MK, and eleven folios are from the BP.

The MK was a Sanskrit verse text written by Nāgārjuna (ca. 150–250), a renowned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er. This treatise is the fundamental text of the Mahāyāna Buddhism. It gives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emptiness (*Śūnyatā*), which serves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remaining three folios of the above mentioned MK manuscript have preserved 107 verses (9.10–12, 10.1–16, 11.1–8, 12.1–8a, 17.29–33, 18.1–12, 19.1–6, 20.1–24, 21.1–21, 22.1–5), which amount to approximately one fourth of the whole work. According to an unpublished catalogue compiled by Luo Zhao, a complete manuscript of the MK is preserved at Drepung Monastery in Lhasa. This is the first independently

transmitted Sanskrit version of this work to have been found, but it is not accessible to scholars at present. Therefore the three folios reported here represent the only available manuscript of such a text.

The BP was a commentary on the MK and was named after its commentator, Buddhapālita (ca. 470–540). This is the only one of his works that has survived until today. Buddhapālita was a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Madhyamaka thought.

For a long time the Sanskrit text of the BP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lost and was only available through Tibetan translation. The remaining eleven folios of the aforementioned BP manuscript represent an unprecedented discovery. The incomplete manuscript contains 57 verses with commentar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text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BP is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Akutobhayā* from chapters 23 to 27. Besides, the newly discovered folios do not include these chapters. Therefore, the question whether Buddhapālita had a different commentary on these five chapters remains. Counting in these chapters based o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the eleven folios comprises approximately one ninth of the whole work.

Date and region of the manuscripts

As the remaining folios of these two manuscripts do not bear a colophon that records the date, the paleographical features are the only dating evidences.

Indian scripts have undergone a gradual evolution from the early Brāhmī script in Aśoka inscriptions of the 3rd century BCE to the regional scripts after 10th century CE. This enables us to estimate the date and region of a certain script. After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I found that the script of these two manuscripts exhibits features of suggestive of eastern scripts and resembles the characters used in Nepalese inscriptions. Since inscriptions often include dates, due to their function as a record of meritorious deeds, and in order to build up a reference frame, I selected more than thirty samples from the rubbings of Nepalese inscriptions from 5th to 8th centuries with an average interval of nine years. After matching each character of our manuscripts with the references, these two manuscripts could be roughly dated betwee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7th.

Judging from the date and region, this script should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the so-called *Siddhamātrkā*. Insomuch as the typical features, the geographical scope and the time frame of this term remains unclear, I avoid using it and adopt the region-time naming method instead. The script of these two manuscripts could be called an eastern variety of the post-Gupta script.

Based on this dating, the manuscripts would be the oldest of Madhyamaka text known so far. Mo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ound in Tibet are no earlier than the 10th century, and one of the reasons may be the suppression of Buddhism in Tibet in the 9th century. Therefore it is a surprise to find such ancient manuscripts in Tibet, which dated only around a hundred years after Buddhapālita's commentary was composed. It pushes forward the frontline of the study of Madhyamaka texts by at least five or six hundred years.

Textual examination

Although the Madhyamaka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 not many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its texts have survived until today. The Sanskrit text of the MK was only first known to the modern world through Candrakīrti's commentary of the 7th century, the *Prasannapadā* (PSP), which was edited by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century that followed, more than a dozen new manuscripts of the PSP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suggest emendations to the verses embedded in La Vallée Poussin's edition. However, all the sources of the text are monogenic, namely, extracted from Candrakīrti's commentary. It is frustrating to read a text like the MK only through a commentary composed five hundred years late. What is more, most manuscripts that are available to us were copied another millennium later; the two earliest manuscripts are no earlier than the 12th century. Often scholars have to rely o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order to make conjectures the original wording and meaning of Nāgārjuna and to sort out the dissents from different commentators. This situation is changed by the discovery of these two newly identified manuscripts.

These two manuscripts are not in good con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leaves are missing, and several remaining folios are heavily damaged. It took me two years to finish the editions provided here and to reconstruct the gaps. The two manuscripts have preserved altogether about one hundred and fifty verses, which amount to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of the MK. Coming from a separate stemma and reflecting readings as early as the 6th or 7th century, these textual witnesses inject fresh blood into th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Madhyamaka.

On the basis of these two newly identified manuscripts, we can not only conclude that nine verses of the MK in former editions require emendation, but also trace some hints of the work's textual lineage. It has been noticed earlier by scholars that discrepancies can be found in the same verse embedded in different commentaries in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Scholars therefore conjectured that these discrepancies

are not always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translators, but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Sanskrit text. This is now confirmed by these two newly identified manuscripts.

The MK text embedded in different commentaries that are handed down to us through different languag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the first group belong the earlier commentaries: the *Mūlamadhyamaka-vṛtty-akutobhayā*, the *Zhonglun* (中论) written by so-called Piṅgala, the BP, the *Prajñāpradīpa*, and the *Dasheng zhongguan shilun* (大乘中观释论) written by Sthiramati. The second group consists of the PSP alone. After comparing the verses preserved in these two manuscripts with those cited in each commentary, I found seven discrepancies which show that the MK text in our two manuscripts is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embedded in the earlier commentari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the manuscript of the MK there are another five readings which can only be traced in the *Zhonglun* and the *Dasheng zhongguan shilun*, but not in the *Akutobhayā*, BP and *Prajñāpradīpa*. This shows that the stanzas found in the MK manuscript discovered at this time are not those extracted from the BP manuscript, but could rather be traced back to a separate line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two manuscripts were bundled together and were most probably copied by the same scribe.

These textual discrepancies are merely fragmentary information; nevertheless, they have changed the criterion for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MK. The criterion is no longer simply whether a reading is correct or not, but the textual lineage ha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refore the philological task of scholars working on the MK is no longer to simply suggest emendations to former editions, but to draw a genealogy of its transmission.